

## 技术进步与孩子成本的转移

田雪原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100 多年前马克思作出的“贫困会产生人口”<sup>①</sup>的论断, 是一句至理名言。然而贫困何以会“产生人口”, 人口经济学家多从贫困条件下边际孩子成本较低, 特别是从抚养费用低这方面加以分析。无疑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对指导生育实践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以为这样的分析还远远不够, 在边际孩子成本分析中, 没有将技术进步放到应有的位置; 在边际孩子效益分析中, 更缺少不同技术条件下本质差异的论证, 因而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孩子成本——效益研究的深入, 尤其是由孩子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转移研究的深入。

### 一 两种类型的循环

二次世界大战后, 虽然局部冲突和战争此起彼伏, 但就全球观察, 人口与经济同时增长, 人类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根据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估计, 从1950~1990年世界人口由25亿增加到53亿左右, 40年间翻了一番有余, 可谓自人类诞生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与此同时, 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伴随着人口膨胀,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大幅度提高。然而具体分析起来, 世界各地情形则有很大不同。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这样写道: 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与工业国同步前进, 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绝对数下降了。拉丁美洲地区现在有成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低于70年代早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

区, 人民生活已降到60年代的水平”。对他们来说, “80年代是‘被遗弃的年代’”<sup>②</sup>。这是由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变动双重因素决定的。仅以1980~1990年最后10年而论, 世界总和生育率(TFR)平均为3.53, 发达国家为1.91, 发展中国家为4.07。两者不仅相差悬殊, 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 发达国家已低于更替水平, 长此下去将出现人口减少的一天; 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势头颇强, 相当长时间内必然有一个数量继续膨胀的过程。在经济方面, 1980~1989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5%, 发展中国家为2.3%,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还出现负增长, 中东和北非大致在原来水平上踏步, 形成很大反差<sup>③</sup>。这种情况反映着当今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两种不同类型的循环: 一种为低生育率——高人均收入——低生育率, 发达国家大致属于这一类; 另一种为高生育率——低人均收入——高生育率,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总体, 基本属于这类循环。不过应注意到, 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也很大, 情形并不完全相同。

不难看出,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同类型的循环, 实际上是以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的。因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只能带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第243页,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②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

③ 资料来源: 联合国: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90;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较低的经济收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可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众所周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改进技术两条途径，不过在今天早已结束了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强度的做法，而代之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因此人口与经济循环，是建立在一定技术基础之上的循环。这样，上面的两类循环可进一步表述为：初级循环为高生育率——低科技文化——低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高生育率；高级循环为低生育率——高科技文化——高劳动生产率——高人均收入——低生育率。这是在总结了大量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现象后得出的一种抽象，是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一种抽象。或许有人要问，政策干预能否打破或改变这两种类型的循环呢？我以为，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政策的作用只能在每一种循环内部，寻求其最大期望临界值。如初级循环阶段的人口问题，一般表现为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性质；政策目标是在科技、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不高条件下，寻求生育率下降的最大可能性。但要使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例如下降到长期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则比较困难。这样的认识非但没有否定人口政策的作用，恰恰是肯定了政策在人口、科技、经济发展循环中的地位和作用。政策是什么？是政党、国家依据自己的政治路线，为实现某种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这种行动准则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相反，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基础上去制定和组织实施。政策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客观事物内在运动规律的反映。只有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政策，才具有威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效益，才能给自己的活动开辟更多的自由。

中国被公认为是人口政策取得卓有成效的国家，即使如此，也没有冲破上述人口、科技、经济发展基本的循环圈。就生育率而言，40年代总和生育率（TFR）为5.44，50

年代为5.87，60年代为5.68，70年代为4.01，80年代为2.45<sup>①</sup>。70年代以来迅速下降，1989年已下降到2.25，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已属最低水平之列。然而即使在70年代和80年代，总和生育率也始终在2.20以上，没有达到2.10更替水平以下，处在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过渡时期，但尚未进入低生育率阶段。

就经济而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虽然几经波折，国民经济几次大起大落，但总起来看，发展是比较快的，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尤其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人民所得实惠最多。据统计，如以1952年中国国民收入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1989年为1133.4，年平均增长6.8%；其中1979~1989年年平均增长10.7%，1981~1989年年平均增长11.2%，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sup>②</sup>。不过一是由于过去基础薄弱，二是由于40多年来人口一个倍增有余，形成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仍比较低的状况。美国人口咨询局估计，1988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470美元，发达地区15830美元，不发达地区710美元，中国330美元。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估计，198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40美元。目前各国和一些跨国组织对中国的估计出入很大，从人均300美元至1000多美元不等。300美元左右的估计显然受到人民币外汇比价不断下调的影响，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实际。如按1980年人民币外汇比价并扣除10年来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国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77美元左右，尚不足不发达地区的一般标

① 《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图集》，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编绘，198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

②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准,属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

就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而言,40多年来大、中、小学校 and 各类职业学校发展很快,培养的人才一年多于一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这里所指的科技文化,是指同人口文化素质紧密相联的科技文化。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量化指标。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概念<sup>①</sup>,它的含义是某人口群中每人平均所受教育年限,并提出大专按平均上学时间16年,高中(含中专)按平均11年,初中按平均8年,小学按平均4年,文盲和半文盲按平均0.25年计算。这样算下来,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为2.41,1982年人口普查为4.38,1990年人口普查为5.18,人口平均所受教育时间有了成倍的增长,科技文化有了显著提高。同时5.18的人口文化素质指数又确实不高,反映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上,其水平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当前中国在人口、科技、经济两类循环中,正处于由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过渡时期,基本上仍处于高生育率——低科技文化——低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高生育率初级循环阶段。不过应注意到其中的“时间差”:生育率过渡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现已接近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科技文化、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过渡的步子迈得相对小一些,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由此也就应当明确,实现由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过渡这个人口、科技、经济发展的根本战略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使生育率在长期内稳中有降;另一方面科技文化、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为人口与发展循环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解决好其中的关键所在,才能为实现过渡和走上高级阶段的良性循环创造条件。

## 二 技术进步的核心作用

在人口、科技、经济发展循环轨道上,

三者密切相关,任何一项发生变动都会波及其它。例如生育率下降后,由于出生人口减少而使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消费部分减少,积累增加,有利于增加国家建设投资,发展科技事业,促进生产发展和收入的增加。而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不仅能为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素质提高准备物质前提,而且可以为生育率下降后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发展老年社会保障事业打下基础。即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乃是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节人口结构这一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基本方针的基本保证。当前,在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生育率的率先下降已经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但要达到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下降的目标有相当大的难度。国民经济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期望年增长速度很高。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所处的核心地位,技术进步在降低生育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人均收入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其一,科学技术进步降低生育率的作用,是通过刺激边际孩子成本特别是边际孩子质量成本的上升,同时通过削减边际孩子效益实现的。众所周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泛商品观念的无孔不入,一些微观人口经济学家也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角度研究人口生产,提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他们提出,一个孩子的生产可由直接成本,即养育一个孩子直接的货币支出,以及间接成本,即父母特别是母亲因抚育孩子损耗时间而减少收入两部分构成。但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用于孩子基本生活费用和母亲怀孕、分娩期间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是相对稳定的,故构成孩子的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而用于孩子健康和教育上面的费用是不断上涨的,故构成孩子的可变成本或

<sup>①</sup> 参见田雪原:《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报告》,《中国人口科学》专刊(1),1988年。

质量成本。诚然，父母生儿育女并不只是为孩子付出成本，而是为了在付出成本之后取得相应的效益。孩子对父母和家庭最主要的效益是：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消费——享乐效益；此外尚有继承家产的效益，防止家业衰落的风险效益，安全保卫效益等。父母要不要生产某个边际孩子，则取决于孩子的成本效益：若成本高于效益就不需要，若成本低于效益就需要，若成本等于效益取决于随机因素。毫无疑问，这种孩子成本效益理论有其局限性，资产阶级人口经济学家不同流派之间也不尽一致；但这个理论把人们的生育行为和利益得失联系起来，作出量的考察，并且论证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边际孩子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上升，主要效益下降的趋势，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里的要害是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使孩子成本——效益发生失衡的作用。

首先，技术进步导致由孩子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转移，由追求孩子数量向追求孩子质量生育观念的转变。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劳动者的手臂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一个家庭只要使孩子健康地成长到劳动年龄，便能得到一名合格的劳动力，孩子成本低廉，边际孩子成本更低，人们的选择偏好倾向于孩子的数量，由此孩子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占据优势。以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和初级控制机为代表的一次又一次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工具不断革新，技术装备程度越来越高，从而对与之相结合的劳动者在科技文化上提出更高要求。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的技术革命一浪高过一浪，计算机技术、宇航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等的发展，一方面使传统产业受到革命性改造，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不断兴起，从而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劳动者只有学习

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这种形势猛烈地刺激着边际孩子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的增加，发生由孩子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的转移。

其次，技术进步使边际孩子效益下降。由于技术进步，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主要不是靠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有赖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使边际孩子劳动经济效益呈明显下降趋势。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和个人收入的增加，社会可以举办更多的养老保障事业，个人和家庭也有条件储蓄养老，而社会与个人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的普遍建立，使边际孩子的养老——保险效益不断下降。其他如继承家产、振兴家业、安全保卫等效益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从理论上说，技术构成越低，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结合越松散，吸收劳动者的弹性越大，边际孩子的各种经济效益越容易实现；相反技术构成越高，分工越精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结合越紧密，吸收劳动者的弹性越小，边际孩子的各种经济效益越难以实现。技术进步无情地冲坍了传统的“多子多福”的屏障，将少生优育优教多受益的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二，科学技术进步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是通过技术进步与劳动对象相结合，技术进步与劳动工具相结合两个方面实现的。中国经济学界素有生产力“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之争。事实上无论是“二要素”（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还是“三要素”（即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任何劳动过程都必须有特定的劳动对象，而且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劳动对象的新的意义日益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新技术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可以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扩大自然资源的领域；应用新技术可以综合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使用效益；新技术可以扩大劳动对象的利用范围和提高加工的深度，发展

合成材料等新材料工业，大大拓宽劳动对象范围并提高经济效益。

技术进步同劳动工具结合起来，历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人所共知，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不是依据生产什么，而是依据用什么样的劳动工具进行生产，怎样生产来确定。当前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正以巨大的规模和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但与新技术革命相伴而兴起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而且用新技术去改造冶金、煤炭、汽车、纺织等传统工业，进行“再工业化”，从而创造出空前高涨的劳动生产率。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长期持续地较快增长，原因正在这里。今天一部大型电子计算机所承担的工作量，绝非人的手工计算能力和计算速度所能与之相媲美。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在同其它生产力要素相结合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过程中，周期缩短了，作用千百倍地增强了，并且产生了质的飞跃。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具有的能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释放出来。

技术进步具有使生育率下降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双重核心作用。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1990年普查该年年中全国人口文化素质指数计算为5.18，1989年底总生育率为2.25，人均国民收入为1189元。以此为准，人口文化素质指数在该线以上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9个省、市、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总生育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人均国民收入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如北京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为7.65，是全国的1.5倍；总生育率为1.33，相当于全国的0.59；人均国民收入3248元，为全国的2.7倍。辽宁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为6.28，是全国的1.2倍；总生育率为1.51，相当于全国的0.67；人均国民收入1989元，是全国的1.7倍。有

6个省、自治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略高于全国水平，其总生育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大体同全国水平相当。有3个省、自治区的人口文化素质指数虽然高于全国水平，但是总生育率却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有的人均国民收入甚至低于全国水平许多。这3个省区的情况是：新疆人口文化素质指数5.59，总生育率3.16，人均国民收入1232元；海南人口文化素质指数5.45，总生育率2.93，人均国民收入1131元；河南人口文化素质指数5.23，总生育率2.88，人均国民收入836元。为何出现这种超出常规的现象呢？主要是外在干预作用较大。或者受到民族人口政策的影响，或者由于新辟特区外来人口较多且生育难以控制，或者工作上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有些没有落到实处。因此这些情况不具有典型意义。

如果说在中国人口文化素质较低情况下，人口文化素质指数稍高于全国水平的某些地区的生育率、人均国民收入变动不可能完全同步的话，那么在其余12个省、自治区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低于全国水平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部都是生育率高于全国水平，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水平，甚至是亦步亦趋地变动。如1990年年中西藏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为2.23，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43；1989年总生育率4.22，为全国水平的1.87倍；1989年人均国民收入778元，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65。贵州人口文化素质指数4.08，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79；总生育率2.96，为全国水平的1.32倍；人均国民收入625元，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53。唯一例外的是四川：人口文化素质指数5.12，稍低于全国水平；总生育率1.76，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78；人均国民收入809元，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68。为什么会形成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条件下的较低生育率，呈现明显的反差？恐怕主要是该省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有关生育政策的结果。

认识技术进步在人口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还在于,现行的一套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虽属必要,但由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往往使计划生育变成“天下第一难”的工作,难以摆脱对峙和被动的局面。从一个方面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办法非但不可削弱,甚至还会有某种增强,否则就有人口失控的危险;但从另一方面说,对峙和被动总不能永远延续下去,从长远和发展观点看必须进行改革,走以科技进步促生育率下降的道路。即通过技术进步优化选择,使少生优育获得显著效益,多生劣育效益显著下降,甚至出现负效益,使人们从关心自己利益得失上决定其生育子女的数量,进而自动放弃多生超生,自愿少生并实行优生优教,逐步完成由投入孩子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的转移,此乃为由从高生育率——低科技文化——低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高生育率,向着低生育率——高科技文化——高劳动生产率——高人均收入——低生育率过渡的必由之路,通向人口控制“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

### 三 加速孩子成本的转移

中国政府在宣布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时,正确地指出,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亦即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是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从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角度分析,发展教育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在推动人口与发展由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增加着孩子的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相对降低孩子的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本身即构成孩子成本转移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发展教育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必然带来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从而为控制人口增长提供物质保证,刺激生育率下降,有利于由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孩子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即提高子女受教育的程度或文化素质,是能否实现由高生育率——低科技文化——低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高科技文化——高劳动生产率——高人均收入——低生育率循环转变的焦点,或谓关键的关键。

说到发展教育,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增加教育投资,诸如建校舍,请教师,买教具等扩大教育规模的一套办法。无疑这是很正确的。发达国家在由人口与发展初级循环阶段向高级循环阶段过渡时,差不多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要这样做。不过教育费用的增长也要受到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限制,不能增长过快。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而论,在国家财政1979~1988年分类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由761.59亿元增加到1397.00亿元,增长0.83倍;国防费由222.66亿元减少到218.00亿元,下降2.09%;行政管理费由63.05亿元增加到271.60亿元,增长3.31倍;社会文教费由175.18亿元增加到581.18亿元,增长2.32倍(其中教育支出由111.45亿元增加到443.53亿元<sup>①</sup>,为各类支出中仅次于行政管理费,增长幅度较大、增长速度很快的项目)。这样说并不等于国家用在教育上面的费用够了,教育投资勿需再增加了,而是说这种增加不能不顾现实,不计国力,不能一味地指责教育经费太少,增加太慢,还要看一看教育投资的效益。据统计,全世界1987年有大学教师411.8万,大学生5931.6万,大学教师与学生之比为1:14。同年这个比例在日本为1:10,苏联为1:13,美国为1:18,印度(1979年)为1:19,加拿大为1:23,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

而中国只有1:5,差距很大<sup>①</sup>。如果我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大学生人数可增加1.8倍达到美国水平,可增加2.5倍;达到加拿大水平,可增加3.5倍。这说明我们办教育效益不够高。由此可见发展教育眼睛不能只盯在增加投资上,而要在内部挖潜、改革上想办法,走教育“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当前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内涵扩大再生产”上。

无论是走教育“外延扩大再生产”,还是教育“内含扩大再生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道路,都只是解决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实现由投入孩子不变成本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转移的外部条件。无疑这样的外部条件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条件,发展教育、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但是外部条件毕竟是事物变化的外因,要想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和孩子成本的转移,还必须有内在的动力,以及驱动内在动力运转的合理机制。这个内在的动力归根结蒂取决于孩子可变或质量成本的成本效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利益调节机制。假定某边际孩子的可变或质量成本为 $c$ ,父母投入该成本后孩子可能提供的效益为 $b$ ,则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为 $c > b$ ,边际孩子净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为正值,说明父母不能从孩子提供的效益中收回支付在孩子教育等方面的费用,自然人们不肯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家庭人口智力投资。

第二种为 $c = b$ ,边际孩子净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为零,父母从孩子提供的效益中正好补偿支付在孩子教育等上面的费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家庭存在对子女进行智力投资的可能性,但不具备必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父母的智育观。

第三种为 $c < b$ ,边际孩子净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为负值,说明父母从孩子得到的效益超过支付在孩子教育等上面的费用,自然

人们对这种家庭人口智力投资抱以热情。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第二种 $c = b$ 是满足孩子不变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或质量成本转移的必要条件, $c < b$ 是充分条件,是实现转移发动的动机,是根本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只有在 $c \leq b$ 的情况下,孩子不变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或质量成本的转移才会发生,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才会有动力和基础。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总结,违背它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一个时期以来,特别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史无前例”年代,人们目睹 $c > b$ “读书吃亏”的现实,还有多少孩子不变或数量成本向可变或质量成本转移的积极性可言!这种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悖的现象,终于与“文化大革命”一起结束。但在今天改革开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又产生新的值得重视的问题。据统计,尽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学校规模有不小的扩大,教育投资和教师人数有明显增加,然而全国中学在校学生人数却由1987年的5403.1万人,减少到1988年的5246.1万人,1989年的5054万人;小学在校学生数早在70年代中期便开始减少,由当时的15000多万减少到80年代初的14000多万,80年代中期的13000多万,80年代末期的12000多万<sup>②</sup>。这中间有受出生率下降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不过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父母和家庭投入孩子的可变或质量成本不能取得相应的效益,不是 $c \leq b$ ,而是 $c \geq b$ 所致。所谓“教授的笔杆不抵小商小贩的秤杆”,“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从客观上看,1989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935元,最高为地质普查和勘探2558元,其次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2288元,再次为建筑业2171元。科技人才相对比较集中的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为2118元,仅略高于全国水平183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

② 资料来源:同①。

元;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1883元,低于全国水平52元;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1874元,低于全国水平61元<sup>①</sup>。这种分配上不够合理的“脑体倒挂”现象,是造成一个时期以来中小学生失学严重、厌学之风越刮越盛的深层原因,必须认真纠正和加以改革。认真纠正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脑体分配不合理的分配办法,使 $c \geq b$ 逐步改变到 $c \leq b$ ,保证由孩子不变或数量成本转移到可变或质量成本能够带来相应或更大效益。改革就是要建立同孩子成本转移相适应的调节机制,逐步用以利益调节为主取代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完成人口控制机制的转变,利用利益导向原则保证孩子可变成本或质量成本的稳步上升,生育率持续稳定的下降,逐步实现向低生育率——高科技文化——高劳动生产率——高人均收入低生育率高级循环阶段的过渡。

#### 参考论著

1. Gary S. Beck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2. Juliam L. Simon: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1,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ustainable Society,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1.
4. 彭佩云:《大力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为完成‘八五’人口规划而努力奋斗》,《人口动态》1991. 1.
5. 曾毅:《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1. 3.
6. 田雪原:《发展经济,促进转变,寻求人口与经济良性循环》,《中国人口科学》1991. 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人民日报》1991年4月16日。
8.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 〔书讯〕

### 中央党校出版社推出新著 ——《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

【本刊讯】一本记述中国婚姻家庭发展与演变历史的著作——《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去年年末正式出版。这是国家教委组织,任继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的一个分册,著者顾鉴塘、顾鸣塘。在不足6万字的有限篇幅里,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翔实的资料、生动优美的文笔,展示了上起远古、下迄清末数千年的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的历史生活画卷。读者在书中即可寻觅到中国历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轨迹,也可领略一二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本书设计庄重、典雅,长32开便携式,彩色胶印塑膜封面,书内并附彩图多幅,定价2.30元。欲购此书者,请与中央党校出版社联系。邮编100091(凯宁)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